



社会经济史译丛

中国海关与贸易统计 (1859 — 1948)


China Maritime Customs and
China's Trade Statistics (1859—1948)



[美]托马斯·莱昂斯 著
毛立坤 方书生 姜修宪 译
方书生 校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社会经济史译丛

中国海关与贸易统计 (1859 — 1948)

China Maritime Customs and
China's Trade Statistics (1859—1948)

[美]托马斯·莱昂斯 著
毛立坤 方书生 姜修宪 译
方书生 校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海关与贸易统计 (1859—1948)/(美) 莱昂斯著; 毛立坤, 方书生, 姜修宪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308 - 07032 - 4

I. 中… II. ①莱…②毛…③方…④姜… III. ①海关 - 经济史 - 中国 - 1859—1948②对外贸易 - 统计资料 - 研究 - 中国 - 1859—1948 IV. F752. 59 F752.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5061 号

中国海关与贸易统计 (1859—1948)

[美] 托马斯·莱昂斯 著

毛立坤 方书生 姜修宪 译

方书生 校

策 划 王志毅
责任编辑 赵 琼
装帧设计 丁 丁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960mm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139 千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7032 - 4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总 序

就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言，中文与外文（主要为英文）学术圈各自相对独立，尽管现在信息交流与人员往来已经较为频繁，两个学术圈有所交叉，但主体部分仍是明显分离的。相互之间对彼此的学术动态可能有所了解，但知之不详，如蜻蜓点水，缺乏实质性的深度交流，中外学者在这方面都颇有感触。而西方世界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相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更为有限。关于海外中国研究、外国人视野下的中国历史、制度经济学等，由于相关译丛的努力，越来越多地被引入中国学术界。由于欧美、日本与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史、社会史等研究日趋成熟，其前沿性成果更需要我们及时获知，以把握当前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动态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研究中国产生了兴趣，一则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一则因为如果不了解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度的历史，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人类发展，他们希望与中国学术界有更多的交流。

就有关中国的史料与数据而言，中国学者对英文的原始史料涉猎有所局限，遑论荷兰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等，这些语种中有关华人与中国的记载，是在中文正史与野史中几乎看不到的世界。而这些史料，在中西方的比较研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领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待开发的史料还有域外汉文文献资料，包括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地的汉文古籍，以及东南亚、美国等地华

人的文献与文物。仅从这个角度而言，引介和翻译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显得日益重要。就学科而言，由于专门化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各学科形成自身的特定概念、范畴、话语体系、研究工具与方法、思维方式及研究领域，对此但凡缺乏深入而全面的把握，相关研究就很难进入该学科体系，而其成果也难以获得该学科研究人员的认可。而专业人才培养、评审与机构设置等制度更强化了这种趋势。专门研究是如此精深，以致许多学者无暇顾及与其他学科与研究领域，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学术视野因此受到局限，甚至出现学科歧视与偏见，人类追求知识的整体感与宏观认识的需求亦得不到满足。

同时，不同学科的一些特定话语和方法，其实许多是可以相通的，学术壁垒并非如想像中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旦打通障碍，架起沟通的桥梁，游走于不同学科之间，其收获有时是令人惊喜的，原创性的成果也常在跨学科的交叉中产生。如从历史源头与资料中原创出经济学理论，或以经济学方法与工具研究历史问题获得新思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克斯、弗里德曼、哈耶克、库兹涅茨及为人熟知的诺斯、福格尔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因此，“社会经济史译丛”的宗旨与取向为：第一，在学科上并不画地为牢局限于经济史和社会史，也将选择与之相关的思想史、文化史，或以历史为取向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成果，更欢迎跨学科的探索性成果。第二，在研究地域和领域的选择上，将不局限于译者、读者、编者和市场自然倾斜的中国社会经济史，本丛书将力推西方社会经济史的前沿成果。第三，译丛除一般性论述的著作外，也接受史料编著，还精选纯理论与方法的成果。在成果形式方面，既选择英文著作，也接受作者编辑的论文集，甚至从作者自己的英文论著中翻译或加工创作的中文成果。在著作语种的选择上，除英文作品外，还特别扶持其他语言论著的中译工作。

我们希望本译丛成为跨越和沟通不同语种成果、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学科与中外学术圈的桥梁。

龙登高

2009年5月于清华园

前 言

我对当代福建的研究引导我回头关注该省的近代经济史。要研究福建近代经济史，就无可避免地会触及茶叶。我写作此书的目的只在应用海关统计数据，更明确地揭示出清代和民国时期茶叶在福建经济演进过程中的角色。最初，我并无意于研究海关的职能及其统计数据，仅仅是去寻找一份现成的福建茶叶出口统计数据，至少是关于茶叶经福建口岸出口的统计。但当我找到一系列相关贸易统计数据以后，并不能弄清其中的内涵。这些统计数据果真准确地记录了福建茶叶出口贸易吗？——即通常意义上的闽茶出口到福建以外的地区，还是统计了全部经福建口岸出口的茶叶贸易（包含外省茶叶）？仅仅是原出口，还是总出口（包括出售到外地的茶叶再转口到其他地区）？仅仅包括出口到国外的茶叶，还是包括到全部的目的地？只是包括几个主要的品种，如红茶和绿茶，还是全部的茶叶产品，包括茶末和砖茶？

获得一套看似令我满意的统计数据——从定义和范围来看都很明确且不同时段间也具有合理的连续性，实际的处理工作却大大超出我原先的估计，首先需要收集和整理这些统计数据，然后要分析当时这些数据的统计方式及其含义。后面的工作需要进一步深入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弄清海关的职能、工作程序，因为这些统计数据无疑是与海关最初作为一种执行条约规定的手段密切相关的，因此需要探讨

海关职能范围的演变，执行这些职能的方法，及其相关记录的格式。

我写此书的意图，旨在提供一种使用海关统计数据的指南，如何利用这些统计数据，特别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统计数据来研究区域经济的发展，例如研究福建茶叶经济史。虽然本书未能提供有关这些统计数据的概略，但提供了中国海关统计中一份以 Excel 格式记录的完整的数据样本的表单，该表单主要展示了福建各口岸的茶叶出口贸易，也附带包括该口岸的一些其他出口贸易与中国茶叶贸易的概况。（数据样本请到浙江大学出版社网站下载，www.press.zju.edu.cn）

本书中的绝大多数统计数据都与福建茶叶贸易有关，但对于其他省份和其他商品贸易的数据整理和分析也具有示范性，因为这一个案中所遇到的问题在本质上都差不多。

目 录

引言

第一篇 中国海关

第 1 章 中国海关：组织构成与机构职能

- 1.1 起源 / 7
- 1.2 最初的职能 / 17
- 1.3 中国海关职能的转变 / 20
- 1.4 海关统计 / 36
- 1.5 海关数据的不连续和偏见 / 41

第 2 章 贸易账目：定义与结构

- 2.1 商品：计量单位与合计 / 47
- 2.2 贸易账目的基本结构 / 51
- 2.3 定义：单个港口的贸易 / 52
- 2.4 国家贸易统计 / 58

第3章 海关统计利用中的缺陷

- 3.1 这些数字的含义? / 61
- 3.2 概言: 海关数据的局限 / 64
- 3.3 精确性 / 66

第二篇 福建的茶叶贸易

第4章 贸易统计: 福建港的茶叶

- 4.1 从统计中可获得哪类数据? / 72
- 4.2 资料的安排情况 / 84
- 4.3 统计图: 各口茶叶贸易 / 94
- 4.4 结论 / 112

第5章 福建的茶叶出口

- 5.1 从港口到区域: 汇总的问题 / 120
- 5.2 福建口岸的出口 / 132
- 5.3 福建的出口和省内茶叶生产 / 143

后记 / 153

参考文献 / 156

附录

- 拼音和计量单位的含意 / 163
- 数据样本的内容与结构 / 164

引 言

“外国”海关服务（即中国海关，China Maritime Customs，简称CMC），鲜明地展示了有关中国遭遇西方的争论。一派将中国海关视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公共机构——中外人士共同的专业化奉献机构，致力于有序的贸易关系、国家合作、和平走向现代化。另一派将海关视为帝国主义势力的工具，一种渗透入中国政府的主要途径，强化了不平等条约与繁重的赔款，并控制了中国水域的现代航运业。除了海关的本身职能外，中国海关制作的统计，有助于探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国际关系与公共财政，至少有助于讨论当时的经济与社会环境。

可以想见，学者们经常使用海关数据去证明外贸，尤其是中国整体的外贸。对研究中处理国内与本地，而不是全国的贸易数据的论点相对不是那么多，实际上，中国海关控制下各口岸的关册与贸易报告是地方信息的丰富来源。各口岸的相关数据，不仅仅能够表明贸易本身，而且至少直接的反映了当地生产活动的轮廓与更大事件或潮流的地方影响。各口岸和全国贸易统计数据，使我们能在全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比较各口岸的经济状况。除了这一套系统的统计数据（关册和贸易报告）外，中国海关还编制了400余种其他出版物，有些含有丰富详尽的地方史资料。

尽管海关统计数据对于研究地方贸易乃至全国对外贸易具有潜在

的重要价值，但相对于全国统计数据而言，各埠的统计数据更值得深入的研究和发掘。各埠的关册还未能以适当的形式编辑出版，而全国性的贸易统计摘编则已出版了几种：例如，萧亮林（Hsiao Liang-lin）的《中国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这本书之前的杨端六、何厚培的《最近六十五年中国对外贸易统计》以及其他几种。谈到各埠“原始”的统计数据，意味着抓取不同时期不同口岸之间一些不连续的统计资料，统计范围在改变，各埠关册的格式也很不一致。简而言之，相对于全国性统计比较划一的编辑而言，各埠的数据有着更多的缺陷。

本书集中探讨如下几个问题：（1）剖析海关出版物中各口岸的统计数据（主要是各口岸的年报和季报）；（2）以这些统计数据构建各地区贸易波动的时间序列，一个地区通常会包括若干口岸；（3）应用这些时间序列来阐释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本书以闽茶为例来展示这样一个过程。闽茶很早就引起过众多学者的关注，最有影响的研究首推罗伯特·加德拉（Robert Gardella）所著《收获的山岚：1757—1927年福建和中国的茶叶贸易》^①，该书探讨了清代和民国时期福建茶业的发展，但加德拉在使用海关数据时并未根据各口关册系统地整理各埠的贸易统计数据。陈慈玉在其著《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与世界市场》一书中也着力阐述了福建的茶业发展，但仅提供了一小部分相关数据。本书第二篇对与福建茶叶贸易有关的统计数据进行了详尽的发掘，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一项精细的成果，并对上述加德拉和陈慈玉研究中的讹误进行了适当的校正。

与福建茶叶贸易有关的统计数据不仅是先前相关研究的基础资料，而且可以为研究其他各口（或其他单类商品）的贸易提供指南，并对于利用海关出版物进行区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福建设有海关管理对

^① Robert Gardella. *Harvesting Mountains: Fujian and the China Tea Trade, 1757—193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译者注

外贸易的口岸有若干个，这些设关口岸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变化，同样的，海关关册中统计的出口茶叶也包含有若干品种，这些茶叶的品种结构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由于福建是第一批设关开埠通商的省份，因此有关茶叶贸易的数据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有长达 80 年完整的统计序列，为我们研究不同时段和不同品种茶叶贸易的演进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本书的其余部分从比较大的宏观，向更小更细致的微观领域深入。福建茶叶贸易不应被孤立看待，而应深入到海关的职能、组织形式和运作形式的层面。第 1 章简要叙述了海关的沿革史，特别提到了海关职能范围的变化。第 2 章探讨了海关统计数据，并展示了基本的协议与规定，分析各埠如何获取并记录贸易数据，海关总署造册处又如何将各埠的贸易统计编纂汇总。第 3 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概要归纳了使用海关统计数据时应避免的一些缺陷；第二部分两节探讨了与福建口岸茶叶贸易有关的海关统计数据。第 4 章主要围绕海关统计数据本身提出一些看法：可以获得哪些类数据？从何处获得？有哪些年份的数据可资利用？各类断档的年份，统计数据的不连续性，及统计数据所固有的偏差该如何处理？第 5 章分析了海关统计的记录及其所反映的贸易发展史，构建了福建口岸贸易以及福建全省出口贸易的时间序列。

正文中有不少起补充作用的“框”（Box），提供了更详细的材料，从其他侧面充实了正文主题。如书中的框、表、图（地图、曲线图）一样，正文也有很多前后照应很强的节和小节。第二篇的主要内容以 Excel 格式收入到数据样本中，供读者下载并在附录中给出相应说明。

原书没有脚注和尾注，但在每章的结尾都提供了资料来源。数据样本提供了有关海关统计数据更详尽的信息，其中包括涉及的各种海关文献中历年的详细表格。本书结尾的附表强调了正文、栏、表，以及数据样本文件的所有资料的来源。

放行單

同	計	運	商
治	開	稅	人
年		餉	報
月		憑	驗
日		照	船
給		放	裝
		行	完

19 世纪 60 年代的海关放行单

资料来源：韦尔斯·威廉，《中国商业指南》。(S. Wells Williams, *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第一篇 中国海关

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常常难于解释。审读关册会遇到很多疑难问题——数字看起来没有连续性、模棱两可、缺乏可信性，甚至难以理解。所有这些难题，源于海关职能在不同时期的演变，随着海关职能的扩大，越来越多的贸易归入海关的监管。此外，海关特有的统计方式也是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对类似术语给予特殊的规定，各口岸各自的统计方法，各口岸的数据汇总成全国数据时的规定，以及不同时期的会计制度。如何才能克服这些疑难问题呢？这就需要了解中国海关，特别是其在不同时期的职能和统计方法。本书前两章主要就是探讨这些问题的。

“海关”英语通常作 Customs。

汉字“关”的意思是山间的通道、障碍，衍生含义为一个重要的连接点或突破性的事件。在战国时期（公元前 475—前 221 年），“关”表示位于边界地带对往来货物征收赋税的通道。随后很快将水陆主要交通线上的征税点都称为“关”。

最早在“关”字前面加上定语“海”（意思是“海洋”）是在汉代（公元前 206—公元 220 年），特指那些设于沿海地区的关站，以别于内陆关站。在千余年的历史中，有很多个政府机构执掌过这类征税的关站；这类机构中最有名的也许当属唐代及以后几个朝代的“市舶司”，负责管理船只的进出，对外贸易及来华外国人。712 年第一个市舶司设于广州，随后其他市舶司也在沿海港口相继兴起。

17 世纪 80 年代，清政府在沿海地区设立了 4 个征税机构，称为“海关”。但在 1757 年以后，外国船舶只能在广州一关进行贸易，其他 3 关均只管理经营国内贸易的本国船只。如同在早前一样，众多设在内地水路要冲和边界地带的关站，也在发挥着“关”的功能。

1859 年中国海关设立后，“海关”一词通常就专指管理对外贸易的海关（又称“洋关”），而不是管理国内贸易的常关，两者有了区别。最初，海关只监管外国船只及其所载运的货物，常关负责管理本国船只。虽然两者的职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更替，但海关与常关的区别一直延续到 1931 年为止。

资料来源：蔡渭洲，《中国海关简史》。

第 1 章 中国海关：组织构成与机构职能

“中国海关”最早成立于 1859 年，随后开始运作。

1.1 起源

中国海关最直接的前身——上海洋关，是根据 1854 年 6 月 29 日的一项协定设立的。这项协定规定：中国监督管理下的海关开始雇用洋员，其人选由英、法、美三国领事推举。依照 1842 年《南京条约》有关条款达成的外贸税收和船只吨税，由外国税务司负责监督征收。他们须对贸易额、船只数量、税收额进行完整的统计，并兼管审批外国船只的结关凭证和其他单据。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混乱局面，加速了全新的外国税务司制度的出台。这种税务司制度结束了海关长期以来的多种弊端，特别是革除了处理洋商事务方面许多不合时宜之处。老一套海关制度足以应付广州一口通商时代的中外贸易情况，当时一方是由 12 名华商组成的公行，另一方主要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但是，1833 年英国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9 年以后《南京条约》也结束了公行制度对贸易的垄断并新开四口的对外通商（见框 1）。更严重的是老一套海关制度不能适应条约所定关税征收模式的需要。虽然早已存在一

种帝国关税税率，但广州的征税活动实质上具有一种经营性质，且可以讨价还价，正式的税率与海关监督历年汇往官库的数额没有直接联系。根据《南京条约》增开的商埠仍然或多或少地在仿行广州的制度，海关职位成为暗中串通一气的商人、官僚和仆役极力想获取的。虽然鸦片贸易仍属违禁，却更加兴盛起来——显然是在海关人员的默许和纵容下才会有此结果。

上海的外国税务司制度最早开始于1854年，很快遭到那些习惯于老式海关制度的商人们的抵制，但却受到清政府和外国领事的欢迎。上海改制的成功与其他口岸海关的无能形成鲜明对照，这些口岸无法按条约规定的税率（1842年订约，1843年生效）征收关税。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将外国税务司制度扩展到其他通商口岸，将各口的通关手续划一办理；取消外国领事对各口税务司的提名推荐权；修订了1843年税则；将鸦片列入征税品目进而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过去外国税务司制度只是一种地方性的尝试，各国领事经常介入海关事务；此后外国税务司制度被纳入了中国的体制，完全成为帝国政府的一个组成机构。

1859年9月，一名主掌帝国外交事务的大臣任命了首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截至1864年为止，“洋关”已在所有的14个通商口岸开始运作，大多位于常关的附近。常关在海关出现以前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这时并没有撤销，也没有按照海关的原则进行改组；只是如同1854年上海的情形那样，被迫将一部分职能移交新设立的海关，但保留了对民船贸易和土货贸易的征税权。各口的新式海关（洋关）和旧式海关（常关），都将其所征税收上交给本地华籍监督。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税务司制度已推广到30多个口岸，其中有些位于远离海岸的内陆，到1920年，外国税务司管理下的海关已近50处（见框2）。